

灵知视角下的“影响的焦虑”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Reconsidered from a Gnostic Perspective

黄 峰

HUANG Feng

作者简介

黄峰，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UANG Feng, Assi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Taishan College.

Email: huangfengfp@163.com

Abstract

A close reading of Harold Bloom's works shows that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has clear Gnostic features. Ancient Gnostic thought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Bloomian terms, such a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strong poets" and "misreading".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two-layer meaning of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from a Gnostic perspective. Firstly, the superficial meaning of the term refers to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that newcomers feel as a result of the objective influence of their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which negatively hinders writing. Secondly,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term refers to the Gnostic "inspiration" of all individuals, who can demonstrate their originality by constantly rebelling against the anxiety of prior symbols (i.e., misreading), and in this respect the term has a positive constructive meaning. For Chinese readers,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potential Gnostic meaning in the ter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but also note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deconstructive/constructive thinking it contains in expanding textual connotations and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Keywords: Harold Bloom, Gnostic,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Strong Poet, misreading

《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是美国当代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重要代表作。一经出版就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进而引发了关于布鲁姆文论观点的持续争议。例如，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一方面盛赞该书表达的观念“是过去十年最大胆的原创性文学理论之一”^①，另一方面则质疑其批评观点的客观性和严谨性，“在单调的情节概括或者荒谬的长段引用之后再加上一些业余的、不甚严格的评论，这使读者感到无聊”^②。美国学者罗伯特·V.杨（R.V.Young）选择从宗教视角分析学界对该书乃至布鲁姆本人的各式争议，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布鲁姆的批评实践）是一种灵知式神学”^③，这一点或许是布鲁姆批评实践出现争议的关键根源。在面对提倡积极“误读”的布鲁姆时，如何确保对他的理论体系有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乃至反思布鲁姆批评观念的起点。鉴于罗伯特·V.杨只是对布鲁姆批评实践进行基本的概述，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本文拟在回应其观点的同时，通过探索布鲁姆的宗教背景，具体分析“影响的焦虑”这一布鲁姆式学术标签。

一、布鲁姆批评实践的灵知色彩

“灵知”一词最初源自希腊语“gnōsis”，意为“知识”，国内学界也将其音译为“诺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或常识，作为宗教术

^①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159.

^② 特里·伊格尔顿：《异端人物》，刘超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Terry Eagleton, *Figures of Dissent*, trans. LIU Chao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14), 189.]

^③ Robert V. Young, “Harold Bloom: The Critic as Gnostic,” *Modern Age* 47, no.1 (2005):19-29.

语的“灵知”是指与拯救人类有关的真理性知识，自带神秘性光环。它代表着纪元后在犹太人离散区域及西亚地区广泛出现的复杂的宗教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文化及宗教背景中发展而来的。^① 基督教把灵知思想视为正统信仰之外的异端，而信奉它的信徒们则认为这是一种源自个体内在的神圣启蒙，有助于个体从现世危机中得到启发与终极拯救。这些信徒们虽然被统称为“灵知派”（Gnostics，也可见“Gnostic groups”的说法），但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指，因为不同的信徒有不同的灵知教义，并没有形成像基督教那样的体制性教会。故而，所谓的灵知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只能被视为“一个在古代世界晚期广泛传布的宗教运动”^②，只有众多小规模宗教团体的各自传承，最终绝大部分都泯灭于历史尘烟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关灵知的宗教思想却在西方文化中留有明显的痕迹，很多宗教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以及文学家都与其有着潜在的紧密关联。对于布鲁姆的批评实践而言，亦有很多线索显示出他与灵知思想的密切关联。

布鲁姆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找不到他利用古代灵知思想进行文学批评的明确证据。在《雪莱的神话》（1959）、《幻想的陪伴》（1961）和《布莱克的启示》（1963）等三部最早的著作中，布鲁姆虽然表露出对浪漫主义诗歌某种神秘要素之独特性和预言性的关注，却并不意味着这是布鲁姆对灵知思想的兴趣或运用。^③ 但1970年出版的《叶芝》附录显示，“Gnosticism”一词至少出现了42次。^④ “灵知主义”使用频率的突然提升表明此时的布鲁姆注意到了灵知思想。

^① Kurt Rudolph, *Gnosis: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Gnosticism* (San Francisco: Harper&Row, 1983), 277.

^② 保罗·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7页。[Paul Tilli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trans. YIN Dayi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8), 37.]

^③ 仅在《幻想的陪伴》中出现过一次“Gnosticism”，也只是提及该词，并无具体论述。

^④ Harold Bloom, *Ye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495.

这一醒目的转变，还可从布鲁姆1966年的著作《千禧年的征兆：关于天使、梦境和复活的灵知思想》（*Omens of Millennium: The Gnosis of Angels, Dreams, and Resurrection*）中找到明确的佐证。在书中，布鲁姆自称于1965年（35岁）陷入一场精神危机，情况危急到即使通过出国散心、精神治疗等方式都不见好转。后来让其摆脱精神危机的原因，是“1965年拯救我的一段经历：从阅读开始、然后成为某种形式的信仰转变，这同时也是深入个人文学理论之旅”^①。对他产生如此大影响的书籍正是学者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的《灵知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这本书“影响到布鲁姆对这一古代异端之说的接受”^②。这种接受在本文看来，并非布鲁姆对约纳斯观点的传承，而是后者的学术活动为布鲁姆打开了了解古代灵知思想的窗口，使其日后的学术实践活动多了一层来自宗教领域的重要思想源泉。结合布鲁姆在1970年之后对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爱默生（R.W. Emerson）等人的评述可见，此时的他已将古代灵知思想视为摆脱精神危机的途径了，而《影响的焦虑》一书此时尚未面世。

在此一精神危机之后，古代灵知思想就明显地涉入布鲁姆的批评实践中，布鲁姆著作的名称、其使用的核心术语和批评观念等无不带着鲜明的灵知色彩。下列表述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这意味着强力诗人充分地使用灵知者的立场，而后者是西方所有主要修正主义者的前驱。”^③“麦尔维尔对圣经神学的拒斥，以及对自然和历史的近乎灵知式怀疑，可以在其《广场故事》（*The Piazza Tales*）以及后期的小说诗歌中，找到明显的表述。”^④除了主动的宣道、大量创作上的细节呈现外，布鲁姆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地表示了对正统信仰的质疑：

^① Harold Bloom, *Omens of Millennium: The Gnosis of Angels, Dreams, and Resurrectio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6), 25.

^② Alistair Heys, *The Anatomy of Bloo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1.

^③ Harold Bloom, *Poetics of Influence* (New Haven: Henry R. Schwab, Inc, 1988), 127.

^④ Harold Bloom, *Short Story Writers and Short Storie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37.

“我并没有十分正统的宗教信仰。甚至当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对有关灵性的正统观念保持明显的怀疑态度。现在，我只是视正统犹太教为一种……对希伯来圣经的强烈误读。”^① 从这些评述和采访中，我们已可窥见在后期涉及《圣经》文本时，布鲁姆批评实践所持有的误读式诠释立场了。

美国学者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一本关于灵知主义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布鲁姆对灵知主义的运用最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评论理论著作中。”^② 另一位美国学者苏珊·韩德尔曼（Susan A. Handelman）亦认为布鲁姆是一位秉承犹太异端诠释传统的文论家：“虽然布鲁姆的学术专业确实是浪漫主义诗学，但最终不是华兹华斯而是更古老的有关不朽的暗示——灵知主义和卡巴拉诠释体系中伟大的修正主义者——引领着他走向再生。”^③ 在本文看来，这种来自宗教层面的因素，正是我们探究布鲁姆批评理念的起点，正如布鲁姆自己所言：“如果之前有人问过我的宗教立场是什么的话，我一定会说‘犹太灵知主义’（Jewish Gnosticism）。”^④ 从这一思路出发，包括《影响的焦虑》中的同名术语“影响的焦虑”在内的布鲁姆式术语，都有着不应被忽视的灵知式内涵。

不过，“灵知主义”不等同于灵知思想，这是我们探究“影响的焦虑”等术语的关键。本文认为，灵知思想是基于宗教层面的宗教术语，是一种关于现实危机下如何实现拯救个体（而非拯救单一民族）的启示式教义，是犹太教“弥赛亚”观念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被动演

^① Antonio Weiss, “Harold Bloom, The Art of Criticism No.1,” *The Paris Review*, no.118 (1991): 179-232.

^② 罗宾逊、史密斯等编：《灵知派经典》，杨克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8页。[James M. Robison and Richard Smith et al.eds.,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trans. YANG Keqi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658.]

^③ Susan A Handelman, *The Slayers of Mos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183.

^④ Imre Salusinszky, *Criticism in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52.

绎——拯救的关键不在于外在先验的神，而是基于个体内在的“认知”。但从布鲁姆1970年之后的著作可见，他对古代灵知思想的运用虽然十分明显，但略显庞杂随意，并没有绝对地推崇某一灵知派，更多时候是混合式使用各类灵知思想，哪怕这些灵知思想所属的古代教派有着教义上的矛盾冲突。

布鲁姆所谓的“犹太灵知主义”，更应被视为一种源自犹太民族信仰的思维范式。而“灵知主义”更应被视为哲学术语，而非宗教术语，它有着不同于灵知思想的哲理性。对此，约纳斯曾指出“混合性”是“灵知主义”的首要特征：“灵知系统混合了一切——东方神话，占星学说，伊朗神学，犹太传统包括圣经的、拉比的还是神秘的因素，基督教救赎论和末世论，柏拉图主义术语和概念。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大的（混合）效果。”^① 库里亚诺（Ioan P. Coulino）在认可这一观点的同时，还指出“革命性”是“灵知主义”的另一核心特征：“如果它（灵知派）被看作相对统一的现象，那是出于它的基本态度。就其与当时最重要的学说和宗教间的关系来说，这种态度是革命性的。”^② 本文认为，布鲁姆所秉承的“犹太灵知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思维范式：它采取最主要的革命性作为逻辑维度，包容着有关“灵知”的各式教义，在表面的大混合之下，其深层意涵则为对现实处境的否定以及自我认知上的求新求变。这种具有明显哲理性的思维范式，应是我们诠释“影响的焦虑”的关键维度。

二、作为“影响”的灵知式“灵感”

遵循一般逻辑，“影响”是依照时间顺序发生的物理事件。由于

^① Hans Jonas, *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25.

^② 约安·P. 库里亚诺：《西方二元灵知论》，张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Ioan P. Coulino, *Les Gnosés Dualistes d'Occident*, trans. ZHANG Zh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2.]

新人处在时间轴的后端，必然面临前人“慷慨”的“给予”。传统影响观认为这种单向输入的“影响”，是新人可以利用的财富。布鲁姆则认为这样的“影响”只是一种流入式的“给予”，如同星光一样，从一个星星投射到另一个星星上，后者只有被动接受的可能。因此，布鲁姆强调，他提出“影响的焦虑”这一术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指出“我们曾认为的一位诗人帮助另一位诗人成长的说法是多么的不可靠”^①。流入式“影响”不是正面的、有利于新人成长的积极因素，反而是阻碍、约束新人发挥创造性的消极因素，这是前人对新人的单向性输入。在诗歌漫长的发展史中，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会成为优秀的诗人。大量资质一般的诗人只能匍匐在前人的影响之下，走在低级模仿的路上，超越也就无从谈起。此时，这种模仿对于新人而言，没有起到真正意义上的促进作用，反而是一种桎梏，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就好比欠了债务一样，导致新人创作上缺乏原创性。可见，布鲁姆并没有将一般逻辑上的“影响”视为新人的福利，而是将其视为约束、压迫新人的行为。

但如果只是在单向输入这个层面上理解布鲁姆的“影响”，甚至“影响的焦虑”，那就忽视了上述所提及的灵知背景。这里对“影响”单向性输入的分析，只是指出布鲁姆注意到传统影响观存在着被人忽视的偏失或负面作用。本文认为，这种偏失应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学现象，不能算作一种文学理论，更不能视为布鲁姆在理论上的新见解，充其量只能视之为他特别强调的地方。相反，布鲁姆对“影响”一词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自认为）发掘出了“影响”一词的潜在寓意，并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87首的“阅读体验”为例指出，“影响”一词具有双重含义。表层含义是“流入”，这是常见的含义，是一种单向性输入行为，是一种动态的历时性呈现；深层含义则是“灵感”（inspiration）^②的代指，布鲁姆在2011年出版的《影响的剖析》

^①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

^② Ibid., xii.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一书中,再度如此表述。^① 相比表层含义,“灵感”是布鲁姆所认为的个体(包括作者)最神秘的内在天赋。对于作家而言,他们要想在文学史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呈现出源自自我的“灵感”。两相比较,前一层含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开展,有着消极的压抑作用,而后一层含义则体现了对作家创作主动性、原创性的重视,有着积极的建构作用。

不可否认,这种寓意诠释具有鲜明的布鲁姆特色。毕竟他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及诠释结果不是随意的偶然行为,而是刻意为之的个性化批评行为。通观第87首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用“the riches”“fair gift”或“great gift”等词语表示某种潜在的好属性,谁要获得或被给予这一属性都将是美好的事情。但莎士比亚并没有提及这一属性究竟为何物,也完全没有提及“inspiration”或和其相关的词语。可见,布鲁姆的寓意诠释本身,就是在用自己的想法偏离、篡改莎士比亚的诗句,通过个性化诠释给文本增添新的含义。这种诠释行为本身,亦可理解成布鲁姆运用自己的“灵感”,突破莎士比亚诗歌字面义的约束,从而达到革新原有含义、言说自我的目的。

再进一步分析,布鲁姆所谓的“灵感”不同于一般文艺学意义上的创作灵感,而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禀赋。在集古代灵知思想之大成的瓦伦廷派(Valentinism)看来,最高的神性本体是一切的起源,被尊称为“先父”或“深渊”,由他流溢出其他移涌(Aeon),并构成原初的普累若麻(Pleroma)状态。但低级移涌身处父中,却不了解父,这种不自知的状态导致了普累若麻的动荡,并诞生出低级造物主德牧革(Demiurge)、宇宙万物及人类。瓦伦廷教义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为了使普累若麻恢复至原初的平静状态,神性本体通过将自身的神性因子[或称“碎片”,“普纽玛”(pneuma)等]植入人类体内,寄希望于每个个体能够冲破物质世界的囚禁,完成复归原初的神圣使

^① Harold Bloom,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2.

命。简言之，即通过个体寻觅内在潜藏的神性因子，达到复归的拯救目的。本文认为，布鲁姆正是从这一灵知思想出发，将“影响”寓意诠释为“灵感”，赋予其神秘性、先验性、共时性、交互性的特点。此时，作为“灵感”的“影响”不再是单向性的输入行为，而是所有个体都具有的内在禀赋，只不过它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一直处在被遮蔽的状态中。

如此一来，布鲁姆在强调“影响”具有“流入”含义的同时，也建构出灵知式“灵感”之义。一方面，文坛新人需要对前人的流入式“影响”进行抗衡，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坛上拥有一席之地。但新人在时间上的迟来性，决定着他们必然面对已成定局的创作现状，已有文学成就必然限制着新人的创作。另一方面，基于对神性因子的共同持有，个体内在的“灵感”虽然具有不可绝对呈现的神秘特点，但所有个体都需要肩负起不断认知内在“灵感”的责任。由此，“影响”就在布鲁姆的反转式诠释中，具有了积极的指向，作家们要想有所作为，就需从被动地接受“流入”转向主动地寻觅“灵感”。如果新人能更好地寻觅“灵感”，那么前人向新人学习这个奇怪的观点自然也就成了布鲁姆的结论之一。

三、作为寻觅行为的“焦虑”

在弗洛伊德看来，焦虑是个体特定的情感状态，是对“快乐—痛苦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① 所以它既有可能来自于本我突显的压力，形成神经性焦虑，也有可能来自超我严格约束时的压力，形成现实性焦虑。^② 通观布鲁姆的批评实践，可以看出布鲁姆反对

^① 车文博主编：《精神分析新论》，汪凤炎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51页。[CHE Wenbo, ed.,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WANG Fengyan et al. (Changchun: Changchun Press, 2004), 51.]

^② 同上，第49页。

从纯心理学角度探究焦虑，更反对只从外界入手去寻找个体焦虑的缘由。在布鲁姆看来，前者是伪理性主义的代表，而后者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焦虑”之于布鲁姆，正如他对“影响”的诠释一样，同样有着双层含义。虽然在对“焦虑”的划分形式上，布鲁姆确实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做法，但由此认定布鲁姆的批评方法是“精神批评式（psychocritical）方法”^①并不合适，他并不是弗洛伊德派的合格弟子，对力比多（libido）之说没有丝毫的认同感。

首先，从表层含义来看，“焦虑”是外在影响的产物，是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新人在面对前人已有成就时，会因处在历时性的被动影响下，而对自身的迟来性以及创作上的受约束状态产生焦虑的心理。这种由外在“流入”式影响而来的焦虑感，究其本质根源在于时间的单向性流动，所有个体面对前人都必然背负着身为迟来者的原罪身份，被动接受影响也就成了无法摆脱，也无法克服的创作窘境。布鲁姆将这层含义的焦虑感，视为新人面对前人过分强大的影响而无法摆脱时的心理状态，一种对前人早早拥有文字表述权力的无助心态。正如他分析A.R.阿蒙斯（A.R. Ammons）和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ry）等诗人的创作时，就曾如此论道：“从中我能注意到一种对抗诗歌衰亡的力量，虽然它也透露出迟来者的艰辛倦怠。”^②

很明显，这层含义下的焦虑只是历时性的时间产物，一种心理症结，对应的是“流入”式影响。毕竟新人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出现时间，跳至前人的前面争夺表述的权力，所以新人的焦虑心态既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无法克服的。故而，作家越是迫切地表明自己与前人没有关系，反而越是证明他潜在地承受着因前人巨大影响而带来的焦虑心理。从布鲁姆的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甚至布鲁姆本人就是很好的范例。20世纪中叶的新批评派对浪漫主义文

^① Raman Selde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175.

^②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2.

学的贬低，以及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推崇，是布鲁姆早期研究生涯所面对的学院派批评，作为新人的他不可能忽视这种批评观的存在，就好比古代灵知者无法忽视正统犹太教信仰的存在一样。因此，当布鲁姆越是激烈地反驳T. S.艾略特（T.S.Eliot）等批评界前辈时，越是凸显了他对抗式批评的背后深受前人影响的心态：无法驱散的焦虑感——一种批评界迟来者的无奈心理，一种怎么都不愿接受前人影响的防御性心理。

从古代灵知思想来看，瓦伦廷派坚信个体处在与绝对的神性本体的暂时性分离中，这种分离导致所有个体都处在灵知式异化中，是人类深陷生存困境的真正根源。故而，在瓦伦廷派看来，只有当神性本体的碎片（也即内在的“灵感”）被寻觅到或重新予以呈现时，原初的普累若麻状态才能得以恢复。布鲁姆将这种教义思想所蕴含的思辨逻辑嫁接到文学批评领域，认为作家不应纠结于自己作为新人所背负的迟来性，而是应该采取寻觅“灵感”的自主言说行为，以此达到摆脱外界及前人影响的认知目的。此时，“焦虑”就不再是一种心态，而是个体基于自我的自主言说，即寻找内在灵感的认知行为。很明显，“焦虑”的深层含义——布鲁姆所特别在意的灵知式含义——不是一种备受压抑的弗洛伊德式病症，而是一种自主言说的寻觅行为，类似古代灵知者的自我认知、自我神化、自我拯救之行径。“焦虑”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①是个体渴望治愈自我与神性本体分离的认知行为，它要克服的第一个目标恰是自身的表层含义。

将个体被动的静止心态，反转为具有主动性的持续行为，这种诠释的关键就在于布鲁姆对文学实践中个体地位的重新肯定。相对于当时居于学术界主流的形式主义批评对文本本身的固执，文本的生产者反而被不断地边缘化，逐渐成为工具性的中介。布鲁姆反对对个体的

^① 杨慧林：《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YANG Huilin, *Mean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简约化处理，其用意或许正是在于强调文学之于个体，个体之于“存在”的意义。“存在”或意义都不是绝对的超然范畴，它们需要藉由个体加以展现，哪怕只是一种相对的展现。因此，布鲁姆对“焦虑”进行灵知化诠释，乃是对个体认知能力或主体性的肯定，真正的“焦虑”不应是被动的结果，更不应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的流入式影响，而应是个体获取认知、逼近意义的主动性行为。由此而论，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在布鲁姆的批评逻辑中，重要的不是影响导致了个体的焦虑，而是个体的焦虑性行为促进了“影响”/“灵感”的呈现。带有贬义色彩的“影响的焦虑”，只有在灵知视角下，才能具有促进文学实践的积极意义。

简言之，布鲁姆的“焦虑”观亦有双重含义：一是外界约束个体成长的心理结果，具有名词词性；二是个体不断寻觅内在“灵感”的共时性行为，具有动词词性。很明显，对于布鲁姆而言，他更在乎的是个体内在先验的“灵感”，而非关注纯心理因素或外界的“社会力量”，文学史不是历时的影响史或心理史，而是共时的焦虑史。那些被他推崇的经典作家们，正是他所认为的能够充分自主言说的焦虑型作家。在本文看来，布鲁姆对“焦虑”的灵知式解读，其意义不在于略显霸道的赏析式结论，而在于他对个体之主体性、原创性的重新肯定，他将在形式主义批评大潮中被边缘化的个体重新纳入文学批评的中心位置。

四、“强力诗人”对意义的“解—建构”行为

上帝“之后”再无创世，这其中最关键的不是创世的結果，而是谁“先”创世，毕竟最先创世的个体拥有最不受限的权力，在其之后的个体则要面对已成定局的创世结果。这一逻辑在文学创作上同样存在，传统的“影响”观不仅意味着前人对新人有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更意味着前人拥有创作上的“优先权”。所谓的“优先权”是指前人

处在创作顺序的前端，有着先入为主的话语权，决定着创作产物的具体形态，这无疑成为后世新人不得不面对的创作范式。

布鲁姆对这种凭借时间而拥有的优先权，持绝对的反对态度，“构成本书（《影响的焦虑》）的一切内容……均聚焦于创造性思维因对‘优先’强调而来的忧郁困惑。”^①这种忧郁的困惑是文学实践中的新人力图有所作为，却又备受各种规范、经典约束时的必然感受。从这一点看，灵知视角下的“影响的焦虑”，其着力点不在于强调心理层面的焦虑感受，而在于强调个体需要采取主动性言说行为，来消解前人的“优先权”，并赢得属于自己的创作成就。

不过，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作家无法摆脱焦虑心态，只能被动地沉溺于已有影响中。毕竟不是所有个体都能像布鲁姆那样将“影响”诠释为“灵感”，然后通过对抗或偏离来消解前人的“优先权”与自我的迟来性。能以布鲁姆所推崇的焦虑性行为进行文学实践的个体，只能是极少数的杰出人物。对于这些势必要在文学史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伟大个体，布鲁姆称之为“强力诗人”（strong poet），与其相对应的范畴则是其口中的“弱势诗人”（weak poet）。^②相应地，“影响的焦虑”对于普通作家而言，只是一种被动的压抑处境；但它却是“强力诗人”必备的技能，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对抗性能力，一种消解前人“优先权”的颠覆性行为。

仅从信仰层面看，这种区分强者、弱者的思路并非布鲁姆的首创。《新约》就曾对哥林多信众进行“强壮的”与“软弱的”区分，“强壮的”信徒是所谓的“完全者”，坚信自己拥有关于上界的最高智慧，而“软弱的”信徒则是不属灵的，并不知晓最高奥秘。这种区分为我们理解布鲁姆的“强力诗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毕竟他在论及此概念时，背后的宗教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但布鲁姆只算是灵知主

^①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3.

^② Harold Bloom,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9), 6.

义式批评家，而非古代灵知思想的纯粹信徒，“强力诗人”也不属于纯粹的灵知信仰者。布鲁姆只是受到灵知思想的启发，用该术语专指文学实践中那些能够面对前人采取不断革新之行径、能够不断自主言说的个体。

此外，在本文看来，该术语更重要的一面在于它并不限于作家群体，还包括文学实践中的其他主体，比如“强力读者”和“强力批评家”。强力诗人“就是以顽强的毅力始终与成就斐然的前辈们进行对抗的主角们”。^①这一经典表述同样适用于读者与批评家，换言之，在布鲁姆看来，文学实践中的所有新人都具有迟来性身份，都面临着文学史已成定局的事实性影响，面临着如何呈现自己原创性思想的需求；如果不采取焦虑性行为，所有个体都会“人云亦云”，沦为时间轴上的“弱势群体”。

对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布鲁姆而言，他的批评实践始终立足于文学领域，而非纯粹的信仰领域。因此，“强力诗人”对抗前人优先权、消解自身迟来性的焦虑性行为，以及对“灵感”的寻觅，最终是落实在对已有文字符号的陌生化处理上，而非落实在与前人的信仰之争上。被付诸笔端的文字符号，具有物质化、可视化的特点，它在展示个体思想的同时，也因具有表义的优先性，反而约束、禁锢着对意义的后续表述。此时的文字符号如同古代灵知派教义中的物质世界一样，具有“呈现兼遮蔽”的特性，它既代表着个体的部分认知，又无法代表个体的全部认知，即所有文本的文字符号只是对个体内在“灵感”的暂时性呈现。

从这点上看，布鲁姆对文学史对抗性关系的强调，本质上是强调个体与文字符号之间的对抗。“强力诗人”采取的焦虑性行为，乃是不断地对抗、偏离文字符号，以便重新进行表义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抵近被遮蔽的终极意义。因此，当布鲁姆声称“诗歌是对其他诗

^①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5.

歌的回应”^①时，我们不应将此视为对文本间性的强调，而应将其视为对主体间性的强调，即所有个体都有着呈现先验的“灵感”的共通性，都需要对已经化入纸面的文字符号进行陌生化处理。对于作家而言，其结果就是新诗歌的诞生，对于批评家及读者而言，结果则是新批评观点、新阅读体验的诞生。

虽然布鲁姆本人并不使用“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样的字眼，但贯穿“影响的焦虑”批评观的正是陌生化策略，只不过他改用“误读”（misprison）一词进行使用。“误读”具有对文字符号的祛魅或解码功能，是一种陌生化已有文字符号的能力，一种通过“误读早期诗歌”^②来不断拓展文本内涵的能力。很明显，这种“误读”就是“强力诗人”采取的焦虑性行为。其实，不论布鲁姆取名为“误读”“影响的焦虑”，抑或是所谓的六种修正方式（revisionary ratios），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个体用以对抗已有符号、并再度表义的方式。只有“强力诗人”才能摆脱文字符号表面含义的困扰，才能“充分地理解预言与暗示、‘说话’和‘意义’之间的关系”^③，最终找到走出“语言牢房”的办法。

如此而论，“强力诗人”之强力，正是体现在他们同时具有了“解一建构”意义的能力。“强力诗人”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被符号囚禁的真正意义，通过解构的方式加以祛蔽，同时，通过对已有符号的陌生化处理，再度建构起关于意义的全新表述。这种“解一建构”行为，在本文看来，正是布鲁姆所秉承的灵知主义思维范式的投射，在反抗、摆脱或超越前人表义行为的同时，还在积极呈现着独属于自己的新认知。换言之，“影响的焦虑”以及“误读”是一种源自古代灵知思想的诠释策略，兼具“消解”意义与“激发”意

^①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99.

^② Robert Scholes, “Reviewed Work(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by Harold Bloom,”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73, no.2 (1974): 266-268.

^③ 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9.

义的双重逻辑，可以为具体的文本创作、文本阅读以及文本批评，打开强力个体能够积极参与的方便之门。

结语

虽然“影响的焦虑”这一术语有着明确的双重含义，但我们对此还需要保持必要的审视态度：毕竟该术语的出发点——布鲁姆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并不是所有读者或批评家的共同体验。也不是所有人在阅读莎士比亚诗歌时，都会将“影响”寓意解读为灵知式“灵感”。相反，布鲁姆过度的“假设”“虚构”“寓意解读”等行为，会导致严谨的文学批评变成随性的文学创作。因此，“影响的焦虑”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合理化、普遍化加以应用的诠释范式，只能将其视为一种在古代灵知思想影响下的个性化批评观。

但仅就当下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布鲁姆批评实践背后的宗教背景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不仅需要从文学和宗教的交叉领域重新探究包括“影响的焦虑”在内的布式批评观；还要注意到“影响的焦虑”这一术语真正的诠释学意义：它为个体勾勒出一个积极参与文学实践的“灵知式公式”（a Gnostic formulation）^①，这是有利于新人突破已有的思维定势与意义壁垒，从而拓展个体认知的“文学信仰”之道。只有当所有个体（包括作者、读者、批评家在内），都能够对文字符号进行不断的陌生化误读，才能真正推动文学实践（创作、阅读以及批评）的发展，才能真正获得文学本身所给予的意义。

^① Alistair Heys, *The Anatomy of Bloom*, 2.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_____. *Poetics of Influence*. New Haven: Henry R. Schwab, Inc, 1988.
- _____. *Short Story Writers and Short Storie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 _____.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_____.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 Handelman, Susan A. *The Slayers of Mos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 Heys, Alistair. *The Anatomy of Bloo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 Jonas, Hans. *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 Rudolph, Kurt. *Gnosis: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Gnosticism*.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3.
- Salusinszky, Imre. *Criticism in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 Scholes, Robert. "Reviewed Work(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by Harold Bloom."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73, no.2 (1974): 266-268.
- Selden, Rama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 Weiss, Antonio. "Harold Bloom, The Art of Criticism No.1." *The Paris Review*, no. 118 (1991): 179-232.
- Young, Robert.V. "Harold Bloom: The Critic as Gnostic." *Modern Age* 47, no.1 (2005):19-29.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车文博主编：《精神分析新论》，汪凤炎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
[CHE Wenbo, ed.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by WANG Fengyan et al. Changchun: Changchun Press, 2004.]

- 约安·P.库里亚诺：《西方二元灵知论》，张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Coulino, Ioan P. *Les Gnozes Dualistes d'Occident*. Translated by ZHANG Zh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特里·伊格尔顿：《异端人物》，刘超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Eagleton, Terry. *Figures of Dissent*. Translated by LIU Chao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14.]
- 罗宾逊、史密斯主编：《灵知派经典》，杨克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obison, James M. and Richard Smith, eds.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Translated by YANG Keqi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 保罗·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Tillich, Pau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Translated by YIN Dayi.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8.]
- 杨慧林：《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YANG Huilin. *Mean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